

经典的焦虑

——当前文艺思潮的审视

周晓风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文学中的经典是指那些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代表作品。文学经典在文学发展史上既具有确定文学标准尺度的作用,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文学经典作品在近年来出现大量重版、改写和重评,成为当前文艺思潮的突出现象。这既是消费时代社会心理对于经典作品的需要的反映,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英文化层对于当今经典缺失的焦虑。

关键词:文学;经典;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5-0051-05

Anxiety of Classics: Scan the Trends of Thoughts in Art and Literature

ZHOU Xiao-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s in literature refer to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have model meaning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Literary classics not only have the function of scale of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but also can meet readers' aesthetic demand of different eras to a great extent. The republication, rewriting and comment on classical works of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become the outstanding phenomenon of present trends of thoughts in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need to the classical works of social psychology of era of consumption, and reflects the anxiety of culture elite to lack of classics nowadays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literature; classic; anxiety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典”是一个标明历史和传统的词语。“经”为“经常”,即历久不变的常道,引申为不刊之论和经书,如“四书五经”、“十三经”等;“典”为“典范”,指事物的“标准”和“范例”,具有可以被反复引用和反复阐发的文化价值,引申为“典故”或“典籍”。因此,经典常常是指那些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之文本。用罗兰·巴特的说法,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可写性的文本。洪子诚先生还有一个简洁的说法,认为“‘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1]根据这样

的基本理解,文学中的经典就是指那些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作品,构成文学史序列的代表作品,被后人反复阅读、反复解释的作品。当然,也有的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经典”这个词语,如重庆作家莫怀威的《经典关系》所说的“经典”大约相当于“典型”的意思。

与“经典”相近的概念还有“名著”。文学名著往往也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精华和代表。但名著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筛选才有可能成为经典。那些未能经受时代检验的文学名著则只能是名著或代表作,而不能成为文学经典。因此,经典的产生不可能是一时一事的产物,更不可

收稿日期:2005-07-14

作者简介:周晓风(1957-),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文联副主席,重庆作协副主席,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60余篇,已出版专著5部。

能由某个权威人物或权威机构来发布,而是历史的和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经典在文化发展中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经典在文学发展史上既具有确定文学标准尺度的作用,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文学经典的形成及其演变也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经典现象往往受到读者的极大关注,也引起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有时候人们也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经典一词,反映了社会对于经典的广泛需要。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是一个不断打破传统的旧的文学经典和不断建立新的文学经典的过程。相比较而言,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破坏和解构要大于新的经典的建立。这既反映了当代文学的不成熟,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体现了当代文化建设的焦虑和浮躁特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和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文学经典问题愈益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以至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经典成为文学界一个新的、挥之不去的情结,发展到今天,成为当前文学思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文学经典现象在当前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错综复杂的种种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二

其一,经典作品的大量重版,成为近年文学经典现象的突出表现。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99年推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目以来,就陆续分批系统再版这100部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从2000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及其所开列的中学生文学读物推荐书目,推出“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丛书成为该社的一个品牌。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的100种“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重新包装出版这100部中外文学名著。2003年起,该社又再版新时期以来出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丛书”22种。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再版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35种。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致力于系统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丛书》,共出版世界文学名著200种250卷。上述这批文学名著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进入文学经典系列。

这些经典作品的重版,一方面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典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经典作品的改写,也是近年来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新的遭遇,包括改写和改编,尤其是所谓“红色经典”作品的改写和改编,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热播,掀起了新一轮文学名著改编热潮。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1月起至2004年底,有近40部所谓“红色经典”电视剧立项拍摄,总量超过了850集,由此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以至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下旬不得不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职能部门加强指导,使制作单位在改编“红色经典”时把握好分寸,避免在制作方向和导向性上出现偏差,进而引起有关“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讨论。

其中,有些作品的改编确实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多次再版,是一部在文化大革命前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新时期以来,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发行量已经达到80余万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作品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和白茹之间增加了一位苏军少校萨沙,形成一种三角男女关系;杨子荣也平添了一位旧情人槐花;更复杂的是,槐花曾经被小炉匠栾平强奸过,槐花的儿子则被座山雕收养,使杨子荣与以座山雕为首的土匪之间的阶级仇恨渐渐演变成个人恩怨的情天恨海,被一些媒体认为格调低俗。^[2]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由电影改编的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3]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源自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直属娘子军连的事迹,也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了作家梁信的关注,后来梁信根据他所采访的材料写成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演后轰动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改编为芭蕾舞剧,成为“文革”中著名的8个样板戏之一。但“红色娘子军”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却都被那时的“光环”遮蔽了。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散文《万泉河雨季》中写道:“成立于1930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即‘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有的嘴里还咬

着敌人一只耳朵。他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生活却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进了感化院,更多的是自力谋生,也有的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包括有些人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以后又在抗日斗争中牺牲——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4]

正是这些引起了广东作家郭小东和晓剑的极大兴趣,进而创作出一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该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对电影《红色娘子军》做了大胆的解构、改写,在保存了原作故事架构的同时延展了历史,以模糊不确定、似是而非的形式,塑造了一组新的人物——形同原著人物的女红军冯琼花及其“孙女冯”(原文如此)、琼花恋人钟伯、自诩为南霸天孙子的电影人符天等。小说每章的上半部都是“孙女冯”的自叙,语言风格则是村上春树的。每章的下半部则是红色经典似的历史叙述,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引起人们对以往“经典作品”的反思。

此外,京剧《沙家浜》被浙江青年作家薛荣改写为中篇小说《沙家浜》^[5],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引起了一场关于“沙家浜”的轩然大波。京剧《沙家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所谓“八个样板戏”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其中新四军排长郭建光率领18个伤病员隐蔽在芦苇荡养伤,地下党员阿庆嫂在沙家浜镇上开着“春来茶馆”作掩护,当地土匪胡传魁勾结三方(蒋介石、日本鬼子、青红帮)与新四军对抗,最终被新四军消灭,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成为几代人心目中的定格。但在中篇小说《沙家浜》里,阿庆嫂成了胡传魁的姘头,胡司令是这儿唯一敢站出来拉队伍打鬼子的,郭建光和他的新四军总是来去无踪,而且郭建光还以交出新四军大部队撤离时留下的军火为条件请胡司令的队伍帮忙端掉日本人的炮楼救出新四军的伤病员,最后在争夺阿庆嫂的过程中胡传魁略施小计,使郭建光败下阵来,落荒而逃。

这与人们已经熟悉且带有革命色彩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比起来,的确是太离谱了。因此,小说一发表,就有文章对该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整篇小说,看不到人民对子弟兵的支持,看不到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情深,连阿庆嫂都帮着胡传魁(尽管有些无奈),人民军队的代表郭建光被丑化成一个既无计谋也无胆量,连个草包也斗不过的人。按照小说的叙述,最后是胡传魁的部队炸了鬼子的炮楼,换句

话说,是国民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文章还指出,“小说创作允许虚构,允许改写,但决不允许随意伤害历史人物形象在大众情感中所积淀起来的价值取向。”^[6]也有评论认为,“《沙家浜》原作是有史实基础的。而该同名小说胡编乱造,是非不讲,好坏颠倒,不顾大众情感,势必会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此类现象必须坚决制止。”^[7]由此,浙江省作家协会和《江南》杂志均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映出红色经典作品在改写中所遭遇到的另外一种问题。

其三,经典作品的重评,也是当前文学经典作品所遭遇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通过重新评价文学经典作品来重温甚至是重新树立文学经典。近年来,全国各级各类出版社纷纷大量出版过去的文学经典作品,这本身就带有重新评价这些文学经典的意味。一些对于文学经典作品集中评析的教材或著作的出版,更是直接突出了对于文学经典的重新树立和重新评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思和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8]、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9]和温儒敏、姜涛编著的《北大文学讲堂》等。^[10]这些“导读”或“选讲”所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篇目以及评价的尺度并不相同,但仍然有基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对于过去的文学经典的重温或重建。

另一种情况是通过重新评价文学经典作品来推行新的文学价值尺度,达到重写文学史和重建新的文学秩序的目的。这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上海的一批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及稍后渐次展开的对赵树理、丁玲等的重新评价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1994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王一川和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继而以其惊世骇俗的重排大师座次引起强烈反响。该“文库”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小说卷”中把金庸、张爱玲列为大师,而把茅盾淘汰出局;在“诗歌卷”中把穆旦、北岛列为20世纪中国排名第一、第二的诗人,臧克家、郭小川等诗人则与大师无缘,从而引发一轮“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争论。与之相关的则还有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11]、唐小兵的《英雄与凡人的时代》^[12]、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13]、程光炜的《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等。^[14]此外,文学史写作的盛行是近年来突出的文学现象。仅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就有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15]、张炯

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16]、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17]、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18]、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金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1]、孟繁华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2]等。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对一度混乱的文学经典秩序给予了重新梳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新的文学经典的尺度和名单。这一重新经典化的过程尚未完全结束,但新的文学秩序已大致形成。

三

近年来围绕文学经典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是当前文艺思潮发展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社会心理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原因。

其一,对于文学经典现象集中的、大规模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它可以说是消费时代社会心理对于经典作品的需要的反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使得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一种特殊的消费时代。其在文化方面的突出特征是,文化不再仅仅是传统社会中少数精英创造的教化精品,而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大众化、娱乐化和平面化的一次性消费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而引起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变革。一方面,消费时代文化平面化发展,可以最大限度满足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第一次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人。文化与大众的结合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深入和广泛的程度。这就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和市场。消费时代的逻辑是要把一切文化产品包括传统的经典作品市场化、平面化和娱乐化。这就必然造成对于经典作品的巨大诱惑和冲击。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平面化畸形发展,又必然在总体上导致文化结构失衡,并且使大众文化在品质上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肯定的文化”^[23],丧失文化的批判功能。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典作品发挥其特有的文化功能,以解决文化消费带来的平面化和娱乐化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消费时代的社会心理需要带来了经典作品的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对所谓“红色经典”的改编可以说主要就是这样一种思潮的产物(甚至也包括“革命歌曲”的卡拉OK化)。而且,那些所谓“红色经典”恰恰又在这一过程中被解构掉了。

其二,精英文化层对于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文学经典作品受到广泛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经典作品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一方面,在传统的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相分离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作家对于文学作品在创作、流通和欣赏等方面的垄断使得其中的一部分作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因其特殊的身份而在传统文学话语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精英作家创造经典,普通大众仰慕经典,历史典籍书写经典。经典成为一种不易获得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这又必然导致了经典作品成为精英文化层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获得文化特权的凭据。因此,在消费时代里,文化的大众化价值取向逐渐取消经典作品原有的权力,导致精英文化层产生经典缺失的焦虑,从而使其开始考虑利用其手中的文化权力,通过重树经典作品的地位,达到重新获得文化权力的目的。前述经典作品的重新评价中的第一种情况,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精英文化阶层的权力从理论上讲仅限于文化领域,其作用也应当仅限于文化领域。但传统精英文化阶层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有着特别密切的关联,所以不排除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同携手对付平民文化的可能。例如,传统的大中小学的课本其实一直都是以向学生传播经典作品为目的。其中既包含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精英作家的立场。而近年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关注,也包含了要解决人们对于经典的所谓“信用危机”问题。这种经典危机的严重性在于,人们不仅对许多过去的所谓经典作品产生了怀疑,甚至根本上否认经典的价值(解构经典成为20世纪90年代自王朔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之一)。这正是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经典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除了上述原因外,经典作品的传播规律也是经典作品受到广泛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观念形态文化作品迄今已有口头文本、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等几种主要方式。从传播学角度看,大约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知识更新和新的知识接受时代出现,相应要求有价值的作品重新出版,同时淘汰那些不能经受历史检验的作品。这一时间的间隔随着文化发展的速度而有所不同。在传统社会,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百年甚至千年(即清代赵翼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所涉及的所谓经典作品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并且在口头文本和纸质文本时代又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但在现代社会知识创新速度加快特别是电子文本快速发展的情形下,所谓经

典作品再版的速率明显加快,并且与世俗化生活构成某种结构上的平衡关系。据专家研究,近30年以来知识创新的总量,是过去2000年知识量的总和。到2020年,知识的总量将增加3-4倍。到2050年,目前的知识将只占届时知识总量的1%。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知识衰减的速度大约为每年15%-20%。知识创新的速度几乎5年就要更替一次。某些行业(如IT行业),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和技术更新换代。与之相关,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传播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方式有所不同。一是出版和再版的频率加快。前述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来再版文学名著的速率明显高于此前,容易形成文学经典作品的消费和阅读热潮。二是商业利润的追求与文化品牌的同步。文学名著的出版和再版,打的都是文化牌,但经过现代传媒的包装策略和传播手段,其经济效益往往十分可观,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三是经典作品在保持原有经典性的同时,其文化品格和定位逐渐发生变异。最显著的特点是经典作品变得更好看了,而那些原来就好看的文学经典作品(如《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等)往往在今天的文学市场上更是占尽先机。尽管大众传播时代文化出版机构对作品和特定读者群的选择也存在某些偶然性。但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避免的。深入理解文学经典作品现象产生及其传播的规律,也是正确把握文学经典作品的形成及其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 [1] 洪子诚. 问题与方法[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233.
- [2] 《林海雪原》起波澜[N]. 海南日报,2004-03-11.
- [3] 郭小东,晓剑. 红色娘子军[M]. 广东:花城出版社,2004.
- [4] 韩少功. 万泉河雨季[J]. 当代,2003,(3).
- [5] 薛荣. 沙家浜[J]. 江南,2003,(1).
- [6] 萧河. 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N]. 浙江日报,2003-02-18.
- [7] 张山. 劝君莫骂阿庆嫂[N]. 中国文化报,2003-02-22.
- [8] 陈思和.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9] 钱理群.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Z].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0] 温儒敏,姜涛. 北大文学讲堂[Z].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11] 黄子平. “友朋”中的叙述[Z].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12] 唐小兵.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Z].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13] 李扬.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Z].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 [14] 程光炜. 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Z].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 [15] 王庆生. 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16] 张炯,等. 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三卷本)[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 [17] 黄修己. 20世纪中国文学史[M]. 广州: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 [18]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9]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20]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两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21] 金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 [22] 孟繁华,程光炜.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23] 马尔库塞. 文化的肯定性质[A]. 审美之维[C]. 北京:三联书店,1992.